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RANCE, MAY 1968

現代名著譯  
**法國1968**  
終結的開始

ANGELO QUATTROCCHI  
and TOM NAIRN

趙剛／譯註

現代名著譯叢

---

# 法國 1968

終結的開始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rance, May 1968

---

安琪樓·夸特羅其 著 趙剛譯註  
湯姆·奈仁

現代名著譯叢

## 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

1998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20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Angelo Quattrocchi & Tom Nairn
譯註	趙剛
執行編輯	李國維
發行人	劉國瑞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電話：23620308・27627429  
發行所：台北縣汐止鎮大同路一段367號  
發行電話：26418661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ISBN 957-08-1880-8 (平裝)

###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 France, May 1968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Verso 1998

© Angelo Quattrocchi and Tom Nairn 1998

First published by Panther Books 1968

© Angelo Quattrocchi and Tom Nairn 1968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 / Angelo Quattrocchi  
and Tom Nairn著，趙剛譯註。

——初版。——臺北市：聯經，1998年

面；公分。（現代名著譯叢）

譯自：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France, May 1968

ISBN 957-08-1880-8(平裝)

1. 暴動-法國-1958-

2. 法國-歷史-1958-

3. 法國-政治與政府-1958-

## 譯註小記

我翻譯這本書有因緣巧合的部分。今年二、三月間我收到新左評論出版社寄來的新書目錄，我訂了幾本書，書飄洋過海到了，然後我馬上讀了其中一本，也就是現在這本書，非常喜歡，特別是第一部分的敘述風格特別，給人很強的現場感和節奏感，加上這本書的兩個作者都是感情充沛立場鮮明，睹其文如見其人，這些都讓我突然發了翻譯心。純粹為了娛己，我翻譯了第一幕，但一翻就翻下去了，想不但要娛己也要娛人。我想到的「人」自是關心台灣社會運動和文化變遷的進步的朋友。在翻譯途中，偶而翻到一些令人興奮的段落，腦袋裡都還會浮起我這些朋友的面容哩！想到他們也會喜歡看，想到他們也許在閱讀的過程中有一些心得感觸，想到如果還能促成一些討論……只要想到這些，翻譯的熱度就下不來。

至於翻譯這本書的非因緣巧合的部分，要怎麼說呢？我想到湯普森(E. P. Thompson)對他的重要寫作的緣起所做的告白，他說，他從不記得他「選擇」做過這個或那個，他的學術實踐都是受某種外在情勢所召喚，摩理斯、布雷克要用他的筆傳遞一種浪漫主義的薪火，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的英格蘭工匠則要藉他的喉訴說那幾乎被布爾喬亞主流史學所遺忘的階

級鬥爭浮沈……。我之所以翻譯這本書似乎也是一樣，也可以說法國1968年的街頭英雄要透過我的中文翻譯讓他們成為中文世界的集體知識與記憶的一部分；讓他們的激進民主的夢想慾望與行動在三十年後，在遙遠的台灣發聲，成為社會運動的一個支援意識，成為「台灣人意識」的一個部分。**讓1968成為「本土」的一部分！**

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學習到很多。我和大多數的台灣讀者一樣是法國1968年五月革命的門外漢（在美國讀書，「六〇年代」是美國人權、新左運動的同義詞），翻譯中如果碰到陌生的字詞典故，我盡量做些基本功，加上註腳，之所以這樣做，一方面是把翻譯當學習，一方面則是希望能盡量降低讀者的閱讀困難。但限於時間和能力，疏失錯誤之處一定不少，尚請見諒。于治中、許莉青、張悅慈、朱元鴻、馮建三、侯念祖與小黑都曾提供音譯上、資料上或是其它的幫忙；特別謝謝Serge Dreyer，他以豐富的在地人知識，熱忱地解決了很多我翻譯上的難題。這些協助都大大減低了翻譯的困難以及錯誤的發生，雖然他們對翻譯之良窳不負任何責任。非常感謝于治中在百忙之中答應我的請求，在極短的時間壓力下為這本書寫序，幫助讀者從更大的範圍內瞭解法國1968的發生脈絡和對之後的左翼思潮與政治所產生的衝擊。

關於譯註有四點說明：

一，由於第一部分以類似散文詩的體裁寫作，所以我在翻譯時小心斟酌，除非必要，不敢妄動原作的標點斷句，以期保

留原文透過形式所傳達的訊息。這點對於習慣中文斷句的讀者，可能不太習慣，請習慣。

二，凡是以阿拉伯數字作標記的註都是我下的譯註。

三，人名與地名在第一次出現時會在中文譯名之後附上原文，再度出現時則省略原文。原文有幾處語言很精彩，如果翻譯成中文就會流失原來的趣味，我也保留原文讓讀者自己品味。

四，年代都用國字，例如一九九八，只有一個例外，即是1968，這一年用阿拉伯字書寫是為了要凸顯這是特殊的一年。

趙剛

一九九八年九月於台中

# 序

我頭一次讀這本書是在 1968 年的秋天，算算也有三十年了，那時候它才剛剛擺上書店的架子，書頁裡頭還兜著街堡戰火的餘溫呢！兩位作者在寫這本書的時候，席捲全法國的大罷工正以風雷水火之姿前進。一千萬人走上街頭，其中有工人，有學生，還有專業人士，同一時期，英國學生也開始隔海唱和，質疑並挑戰在地國的政治體系，那時候英國是由威爾森(Harold Wilson)所主導的工黨執政。

這本書是一份價值不凡的歷史文件，記錄了法國在 1968 年所發生的大事：一個西歐強權在二戰之後首度到達人民革命的臨界點。

要有兩位不凡之士的兩種政治立場的結合，才能有今天這本冊子。安琪樓·夸特羅其(Angelo Quattrocchi)那時候是(現在也還是)一個才華出眾的義大利無政府主義者，來自西西里，他生長在北義大利的科摩(Como)，他父親是一個社會主義者，在當地的學校任教。科摩並不是一個特有趣的地方，夸特羅其後來去了倫敦，打進了一些前衛藝術家和激進份子的圈子，在那兒結識了湯姆·奈仁(Tom Nairn)，更重要的是，還結識了年輕作家兼小說家吉兒·奈佛(Jill Neville)。他倆墜入情網。此時，夸特羅其以其靈敏直覺偵測到東土有大事生，於是這倆口子就搬到巴黎，落腳拉

丁區，等候 1968 找上門來。

湯姆·奈仁——英國人，蘇格蘭裔的社會主義者。在牛津念大學的時候主修的是哲學，但主要的興趣落在美學，對義大利美學哲學家克羅其(Benedetto Croce)的傳統尤其著迷。牛津畢業後，他跑到比薩的師範學校(Scuola Normale)唸書，在曾是克羅其弟子的拉吉安提(Carlo Raghianti)指導下修習美學。在這裡，奈仁從他的義大利同學處頭一回接觸到葛蘭西的著作(那時英文譯本還沒出來)，並且透過葛蘭西認識馬克思。不到 1968 年，他就徹頭徹尾的變成一個葛蘭西馬派，毫無罣礙地運用這一派的語言來詮釋當代政治及社會。這套路數和當時的左翼思想(試舉幾個名字：列寧、托洛斯基、毛澤東、以及切 [“Che” Guevara])軋在一塊兒，聽起來是有些怪怪的。

從義大利回到英國後，奈仁透過密立邦(Ralph Miliband)結識了安德森(Perry Anderson)與布來克伯恩(Robin Blackburn)。他們一夥人著手進行《新左評論》(*New Left Review*)的復刊。奈仁藉機把葛蘭西這個來自薩丁尼亞的革命家介紹給他的新同志們一起討論。這個討論的最大成果就是產生了一套關於英國歷史的新提法，人稱「奈/安題綱」(Nairn/Anderson theses)，這個題綱挑戰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假設，也招來了馬派社會史巨擘湯普森(E. P. Thompson)的赫斯之怒。兩造之間的對話是英國左派同志之間知識辯論的範例之一，它所達到的高度在當時並沒有被兩造身旁的好事者所跟上。★

---

★如今，這個辯論在一些學院派歷史學者的歷史書寫裡已經被掃地出門了。布勞克力斯(Laurence Brockliss)以及伊斯威特(David Eastwood)在



這本書分成兩部，它們在語調和風格上容或有異，但在根器度量上並無二致，都充塞洋溢如火山爆發般的熱情，抒發對未來的希望和樂觀。那時候我們都篤信法國的五月事件是一個新世界的前鋒。這本書的寫作就是為了要喚起全世界的青年，把他們從沈睡中搖醒，激勵他們走上自己的政治與社會解放之路。

彼時，夸特羅其在巴黎街堡裡寫作，一部分一部分的寄給當時在倫敦的奈仁，他這些既抒情又言志的散文詩是這個事件的當年最佳報導。這種筆鋒燃燒著熱情的戰場報導，只有寫作者親臨其境方能為之。這玩意兒是假不來的。

奈仁的論文部分則是寫作於弘賽美術學院(Hornsey Art College)為罷課學生所佔領的期間中，那時候他在該校教社會學。我還記得，一個來自威爾斯名喚郝爾斯(Kim Howells)的年輕共產黨員，是罷課行動的學生領袖之一，現在則是所謂的新工黨(New Labor)政府的一員，忙著把夢想化作夢魘……唉，我岔開話題了。

奈仁的論文才情躍然紙上：脫韁縱橫的樂觀、銳利敏感、希望滿滿，對事件中各種派別以後走的路子尤有先見之明。然而，這裡也有一個歷史的諷刺。被奈仁痛批的一個托派組織——法國國際共黨組織(the French OCI)——它的領導者在五月十日的晚上曾

---

他們最近的一本通論性質的英國史著作《多種認同之結合》(*A Union of Multiple Identities*)(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裡，把湯普森的〈英吉利的特殊性〉(*The Peculiarities of the English*) (1978)這篇論文說成是當代歷史有關英國國家機器性質這一問題的第一篇著作。(……)怎麼會呢？〈特殊性〉這篇論文是作為《理論之貧困以及其它論文》(*The Poverty of Theor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Merlin Press, 1978)的一章出版的。假如湯普森還活著的話，絕不會放過他們這種史達林式的竄改歷史行徑。

企圖勸阻學生不要加入街堡鬥爭。這個組織的領導者之一是一個激越青年叫做喬斯潘(Lionel Jospin)。我有些好奇，不知道作為法國社會主義黨的一個領導者，當他在一九九七年被一波法國工人和學生的罷工行動拱上權力寶座時，他是否感受到一種歷史的諷刺？這些工人和學生走上街頭捍衛他們的福利國家和生活水平，令人想起三十年前的那個五月初夏。

這本書雖然寫的是法國，但是 1968 的蜂起，既然也是受到越南農民史詩般的反抗所鼓舞，就不只是一個歐洲內部事件了，它席捲全球影響遍及各大洲。★但唯一立即可見的成功只有出現在巴基斯坦，僅僅是一個學生舉事就引爆了擴及全國的都市動亂，在歷經連續四個月的鬥爭和學生工人的巨大傷亡後，由美國所支持的軍事獨裁者阿亞布大汗(Ayub Khan)的政權終於被推翻。自 1968 年以來世事改變甚劇，蘇聯解體，接著而來的是粗暴的黑手黨資本主義(Mafia capitalism)復出，這些都深刻地改造了這個世界，連**希望**也都，暫時吧，被放逐了。

作者之一的夸特羅其仍舊是一個「六八黨人」(soixante-huitard)。他住在羅馬和塔司卡尼(Tuscany)，過著一個旅者的日子。他寫了不少地下社會導遊書籍以及民眾生活手冊，例如《小孩愛看電視，該怎麼辦？》。他也製作了兩部有關六〇和七〇年代政治與文化議題的義大利語電視影片。世界在改變，人不堪其憂，老夸父不改其志，永遠在抵抗與日俱增的文化市場化。

---

★關於法國1968對全球造成的衝擊的討論，請參閱由我以及華金斯(Susan Watkins)所著的*1968: Marching in the Streets* (London and New York, 1998)。

夸特羅其從六〇年代就攜手走過來的愛人吉兒·奈佛，去年過世了。在夸特羅其從巴黎戰場上把手稿一篇篇的寄到倫敦(在那兒由一位叫做伽利歐[Carmen Callil]的澳洲小伙子快速校對，編輯成書交由豹書店[Panther Books]出版)的同時，吉兒正在趕一本小說——《愛苗》(*The Love Germ*)——由夸特羅其飾演劇中英雄。這本書現在也由新左評論出版社伴隨本書一起出版。至於哪一本應該先讀，當然取決於每一個讀者個人的口味。我的建議是兩本都要讀。

奈仁把對葛蘭西的不竭熱情施展到他的一些作品，像是《著魔的玻璃》(*the Enchanted Glass*)，可謂恰到好處；他把英吉利君主制度解剖開來，展現這個制度如何型塑日後整個聯合王國的文化。藉這本著作，奈仁被視為當今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研究的世界級頂尖權威之一。他最近關於這方面的著作是《民族主義諸面》(*Faces of Nationalism*)，也可望今年由新左評論出版社出版。

重讀《法國1968：終結的開始》，把我拉回美麗青春往事，但我們不要忘記布雷希特(Brecht)的警語：「千萬不要從美好的舊事物開始，寧可從糟糕的新事物出發」。我還記得《新左評論》的某一期裡，奈仁對老工黨發動猛烈的抨擊。很久很久以前，作為一個左派如果還竟放話批評工黨或工會裡頭缺乏民主，那可是大不識時務！但奈仁還是吾往也地朝工黨開炮，指責工會歷來進行的代表票(block vote)<sup>1</sup>是「工黨主義(Labourism)<sup>2</sup>的陰魂不

---

<sup>1</sup> 代表票是指工會或政黨大會時，各工會的代表所投下的票並不等值，他的票值和他所「代表」的團體的大小成正比。

<sup>2</sup> 指受費邊社會主義指導的英國工黨的政策和意識型態，在承認資本主義

散」。在新工黨上台即將滿週年的今天，人們多麼渴望能再度聽到類似的獅子吼。我知道有很多人盼望奈仁開始轉移注意力到當今變局的首要徵候——那個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當代文化與政治（甬提生活即政治 [life-politics] 那一套了）。畢竟，灰撲撲的歷史法則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有朝一日可以被擊碎。

塔裡客·阿里(Tariq Ali)<sup>3</sup>

倫敦，一九九八

---

生產方式和布爾喬亞憲政制度的前提下，透過政黨和組織化工會，僅以追求具體勞工利益為目標，缺乏激進民主的想像。所以工黨主義經常被視為「唯勞動條件改善論」。

<sup>3</sup> 此人是作家兼影片製作人，寫過四本小說，和十二本關於世界史和政治的書，是六〇年代英國重要左翼異議刊物《黑矮人》(*Black Dwarf*)的創刊編委，六〇年代運動的一個重要參與者，目前是《新左評論》編委。

# 五月的弔詭(中文版序)

于治中

我要這個世界  
並且要它原來的樣子  
再一次地要它，永遠地要它  
我貪得無厭地嘶喊著  
：重新來過

——尼采《善惡的彼岸》——

五月，在法國正是春暖花開的季節。在1968年的五月，法國卻突然爆發了它現代歷史上最波瀾壯闊的一次社會運動，整個社會幾乎到達了革命的邊緣。在一個感受不到任何明顯的政治或經濟危機的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卻事前毫無任何徵兆地發生了一場如此驚天動地的事件，完全超乎了任何人的想像，當然也包括了法國人自己。由於其影響既深且廣，如今雖然已經歷卅載，整個事件似乎並未因時間的流逝而完全沉澱下來。相反地，隨著日後歷史發展的不同需要，一直反覆不斷地被討論與詮釋。

「68」已經成為近代法國社會的一項遺產，化作潛藏在人民意識層之下的一種「集體無意識」(inconscient collective)，不因意識形態的不同或黨派的差異而有所區別。事實上，我們更可以將「68」

本身視為是當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一直被壓抑問題的一次無預警式的爆發。運動雖然迅速地結束，可是所顯露出來的症狀，如幽靈般長期纏繞著法國的社會。

事件表面的導火線，源自於當時的大學生對整個高等教育制度的不滿。六十年代，法國的經濟快速發展，整個大學體系卻相對落後。不僅硬體設施明顯不足，無法滿足戰後大量擁入高等學府的學生之需要。所傳授知識的內容也無法跟上社會的腳步，特別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學生，在激烈的市場競爭原則之下，對大學教育變革的要求也因此格外強烈。

面對大學的保守、封閉與僵化，學生的不滿雖然一致，可是由於各方的立場不同，其訴求也各異，甚至相互矛盾。一部分學生的願望，在於高等教育制度的現代化，徹底改善學校的基礎設施，更新教學的方法與內容，提供給學生一個自由、開放與完善的學習空間，最終使經過激烈競爭擠入大學窄門享有受教權利之人，畢業之後，順利的投入就業市場，找到正式的工作。

另一批相對較激進的學生則與此完全相反，並非僅在技術層次對當時的高等教育不滿，而是追根究底，對大學本身的理念以及背後整個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質疑。這些人認為，大學不應該只是一處職業訓練所，工作也不等於餬口飯，生命更非意味著自私、自利、庸庸碌碌與自我壓抑。這兩種相互矛盾卻又統一的觀點，相輔相成，構成了68年五月學運最初發難的基礎。

面對學生的訴求，當時的法國政府非但未積極地回應，反而粗暴地鎮壓，使得事態不斷惡化。由於學生的組織行動得法，且議題切中資本主義社會問題的癥結，以至於事件迅速地蔓延。在極短的時間裡，不僅席捲全國的各大學，並且擴展至工人階級，引發了全國性的大罷工，整個社會癱瘓與國家權力的暫時真空，最終導致內

閣的更動，國會的全面改選與總理龐畢度的下台。

然而，如此鉅大的一次事件，在持續近一個月之久後，卻倏然地落幕。除了少數托洛斯基派與毛派團體繼續堅持鬥爭外，整個社會又迅速地恢復了舊有的秩序。常態的政治活動重新出現，經濟的齒輪也開足馬力，再次高速運轉，整個國家又被導至既有的勞動與休閒、生產與消費的軌道之上。

法國68年五月的學運，毫無疑問地與當時世界各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相互呼應。無論是在波蘭、捷克、德國、義大利、西班牙、英國、美國，青年人對現狀的憤怒與反叛，成為一股無法阻擋的潮流。然而在法國，並且只有在法國，反叛不僅是青年人的，同時也是社會的。除了大學生外，參與的人從中學生、年輕的工人、技術人員，到中層幹部、學院人士、知識份子、專業人士等，包括了社會各個不同的階層，並導致整個國家權力真空與社會癱瘓幾近一個月之久。

與其他國家的學生運動相較，為何法國的學生運動在時間上較晚，可是卻更深入與更廣泛地撼動了整個社會？圖罕(Alain Tauraine)認為，這種獨特的現象與運動最初的導向無關，因為法國學生的訴求基本上與其他國家的學生運動類似，主要的原因應與當時法國社會的特殊狀況與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有關。

六〇年代，在阿爾及利亞戰爭後，整個法國社會積極地朝所謂的工業化國家邁進，一切以經濟或科技的標準作為最高指導原則。增長不僅成為經濟的鵠的，也變成社會與人文領域的共同目標。然而，工業化社會單面向(unidimensional)發展所存在的問題與矛盾卻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與此同時，大眾傳播媒體瀰漫著一股標準文化，販賣著幸福快樂人生的妙方。汽車、電視、度假、舒適、優雅……似乎唾手可得。自由、自主、自在、自足的日子有如近在眼前。一

切的戰爭、社會衝突都煙消雲散，貧窮的消滅、社會的不平等被掃除……彷彿人類終於在工業化的堅實土壤中找到了解決一切困難的依據，歷史也終於越過了前半世紀兩次世界大戰所帶來的創傷。

在這鉅大的反差中，法國國家的角色一直曖昧不清。從殖民帝國轉型成一個所謂的現代民主國家的過程時，法國的國家機器變成一種矛盾的綜合體。它既中央集權，同時又結構渙散，既現代，同時又老舊，既偉大，同時又渺小，既自由，同時又威權……除了在國際上代表這塊土地的住民以外，似乎並無法真正使人民對他自身社會的運作方式產生任何的認同。以至於當不滿的能量積累至一定程度爆發時，因為國家是民主的，所以無法採用集權國家的方式，真正予以武力鎮壓。可是事實上，卻又正是因為國家過於中央集權，不允許社會其他部門的自主運作，以致衝突不斷的發生與擴大。這與其他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在東歐，如捷克、波蘭，在高壓的政治下，學運可以迅速地及強力地被救平。在西方，由於大學制度基本上獨立，以至於整個問題無法延伸至國家的層次。換言之，學生的反叛運動，在東歐，瞄準的對象是國家。在西方，是文化。而在法國，則是社會。

因此，當國家宰制整個經濟生活與社會運作時，文化的反叛成為抵抗權力的一種鬥爭方式。法國五月的學運成功地將政治上的抗爭與文化上的反叛，二者結合成為一種社會的運動。這也是為何其他國家的學運，如德國，大多停留在自身的圈子裡，雖然提出了許多觀念，但只是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批判與拒斥。然而，在法國，時間上雖較晚，卻在具體行動中引爆了整個社會的內在矛盾。在西方現代官僚資本主義社會裡，人民第一次產生了对激進革命的肯定，而不再僅是停留在示威與請願活動的範圍。

按照傳統的社會分析觀點，任何一個重要的社會運動都無法獨



立於工人運動之外，社會運動的主體應是工人，尤其是在像法國這樣具有悠久社會鬥爭經驗傳統的國家，工人階級一直是具有決定性的力量。為何68年五月的事件，是由學生發動與領導，而非工人，則是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

特別是在戴高樂主政的時期，整個法國社會在工業化的過程裡，絕大部分工人並未真正享受到經濟發展的成果。在危機爆發的前夕，總理龐畢度政府的政策充滿了反工人階級的色彩。低工資、劣質的工作條件、專權的領導、對工會活動設置諸多的障礙、嚴重的住屋問題與教育訓練的過度分化等，整個勞動條件的制度化，遠遠落後於德國與英國。

從68年運動的經驗可以發現，社會運動事實上並不完全是由社會的底層，特別是社會、經濟條件最差的階層為主導。如果是這樣，那麼十九世紀就應該是以農民運動為主導，而非工人運動。事實上，決定性的因素應取決於一個社會中宰制力量的本質，以及運動本身與統治階級的關係。這也意味著，不應當僅從社會職業的角度作為選擇的唯一判準。

在商業資本主義社會裡，城市的小市民才是社會運動的主要力量，因為他們真正承受有產者及國家的宰制。在資本主義初期工業化的階段，主要衝突的場域，則是在工廠以及整個勞動的關係之中。而在我們所謂的消費社會裡，問題的主要癥結從生產轉向消費時，文化的層面則顯得格外重要。

在這種意義下，我們可以看到，在形成中的社會運動本質上與工人運動不同。這當然絕不意味著工人所處的不利世界與此全然無關。而是說，工人運動所採取的行動，就社會學上的意義而言，與五月運動不同，可是在歷史層面上卻相互融合。這也說明了五月運動的另一個曖昧與矛盾的特色，亦即運動雖然由學生發難，並擴及